

很多人问我，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好回答。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，手心痒痒都是肉。当然，这是感，倘若平心而论，哪能没有高巧。我想最为洒脱开放，一也能代表的，应当是《变化》。在这之前，典型的时政文字，《交锋》和《呼对塞满王流报刊上的，人云亦云。

# 变化

1990—2002年中国实录

凌志军 著

## 凌志军文集

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，不能接受，想要另辟新途，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。在这之后的《追随智慧》、《联想风云》、《成长》、《中国的新革命》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，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，又以大历史的眼光来衡量瞬间。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，自《变化》之后，便觉得非常困难。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 凌志军文集

---

## 变化

1990—2002年中国实录

凌志军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# 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变化:1990—2002 年中国实录/凌志军著.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8.7

(凌志军文集)

ISBN 978 -7 -216 -05530 -7

I. 变…

II. 凌…

III. 社会主义建设—成就—中国—1990 -2002

IV. D6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8133 号

### 变 化

1990—2002 年中国实录

凌志军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 
邮编:430070

印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 
开本:73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 
字数:394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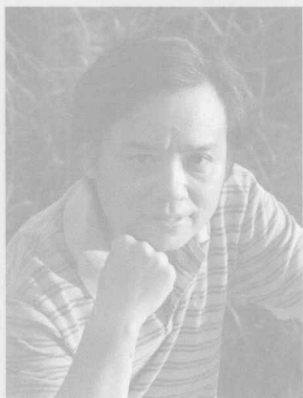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  
印张:22.75  
插页:3

版次:2008 年 7 月第 1 版  
书号:ISBN 978 -7 -216 -05530 -7

印次: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价:39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谨以此书——  
献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 
纪念这个时代所有的开拓者  
祭奠这个时代所有的牺牲者  
呼唤这个时代所有的后继者



凌志军，祖籍广东，1953年生于上海，长在北京。十五岁到工厂做工，十六岁做农民，十九岁当兵，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。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，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。现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、资深记者。

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，被誉为“中国的威廉·曼彻斯特”、当代中国记者的“标杆”。2003年《南风窗》年度人物。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。他拥有广泛的读者。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，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。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。

- 2007年出版的《中国的新革命》，被境内外媒体和研究机构评为当年“值得记忆的好书”、“年度商业书”、“最佳商业图书”。
- 2005年出版的《联想风云》，入选当年“最佳风云榜”，并获得“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”。
- 2003年出版的《变化》，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“年度图书”，同时在台湾获得“开卷好书奖”。
- 2000年出版的《追随智慧》，被媒体评为当年“最佳纪实文学”。
- 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《交锋》引起轰动，也引发了激烈争论，成为当年“中国第一畅销书”。
- 1996年出版的《历史不再徘徊》，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“优秀图书奖”。

# 总 序

收在这里的文字，叙述了 1978 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冲突，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巨细交织，贵贱混杂，都是真人真事，没有虚构。我虽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，但也是眼见耳闻，有感而发。原是九个单行本，陆续印行，现在依原版集中重排，共九卷，没有增删，只是顺序稍有更动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《交锋》和《呼喊》这两本，是和我的同事马立诚合著。他设计了《交锋》全书的构架，并且撰写了其中第一、第二部分，因此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作者。他也是《呼喊》卷三和卷四的撰写者。这两本书当时影响很大，争议也很大，这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如果没有马立诚，就不会有这两本书。

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，这问题不好回答。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。作品好比儿女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当然这是夹杂了个人情感，倘若平心而论，哪能没有高下呢！单说技巧，我想最为洒脱开放、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，应当是《变化》。在这之前，《沉浮》属于典型的时政文字，《交锋》和《呼喊》也是。我对塞满主流报刊上的、人云亦云、套话连篇、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，不能接受，想要另辟新途，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。在这之后的《追随智慧》、《联想风云》、《成长》、《中国的新革命》，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，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，又以大历史的眼光来衡量瞬间。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，自《变化》之后，便觉得非常困难。

## 总 序

《历史不再徘徊》有些特别。有人认为它是我的“巅峰之作”，其实说它是我的“处女作”更接近事实。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。我现在仍很怀念二十年前写这本书的情形，尽管精神上备觉沉重，可是心境特别纯粹，因之能够淋漓挥洒，话也说得痛快。我为这本书耗时七年，终于完成的那个下午，我离开都市的喧嚣，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，盘腿坐在一棵老松下，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，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。那一天天空特别清澈，阳光渐渐柔和，从背后照过来，经过我面前的草地伸向远方。我能够看到天地之间的那条线，一条金色的地平线，发出迷人的光彩。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，伸出手去可以触摸。我对自己说：“你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。”那时候我已年过四十，觉悟得太晚了。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很庆幸当时的选择。对我来说，《历史不再徘徊》不仅仅是一本书。它把我引向一片新大陆。

这些年公开的舆论总说我是作家，但我更愿意别人当我是记者。不是因为记者比作家好，而是因为记者只不过是一个职业，进了这圈子的人，不论贤愚优劣，都叫记者。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这是事实，无关好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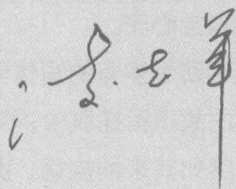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1978年开始做记者，迄今三十年。这一过程刚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合在一起。当初立志于斯，满腔热血，信奉秉笔直书，言无不尽。好像新闻学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教我的。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冲右突，像个没头苍蝇一样，既奋勇，又盲目。后来经历种种希望和失望、欢乐与悲伤，这才知道，这

个圈子里充满了名利的诱惑,也有绵绵不绝的压力、磨难和寂寞。想要守住自己崇奉的信念和品格,不可稍有更动,实在不易。我对那些冠冕堂皇的褒贬并不介意,但是来自民间的喜怒哀乐却能激起我的写作冲动。我想告诉读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。我相信历史上一切民族的重大进步都有一个共同处,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认真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。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。我一页一页地写,一本一本地出版。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,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,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,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,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,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,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重的。记者不仅是瞬间的记录者,也是历史的记录者。现在我可以这样说,我做了我想做的事,我做了我应做的事。我在写作中感受着无穷的激情、智慧和快乐,也因为尽了力而稍觉心安。

然则回想多年的写作体验,并不能让我满足。它给我留下太多的遗憾。我有太多的故事留在腹中,不能吐出;有太多的话已经吐出来,又不得不咽回去。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,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今生是否还能拿起笔来。有时候我设想,如果有来世,我是不是还会做记者? 回答是:会! 我祈祷,到那时候,能够弥补今生的遗憾!

我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愿意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再行出版。我要感谢在过去岁月里为印行我的书而殚精竭虑、甚至遭遇巨大压力的所有编者、出版社和

经销商。我要感谢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们，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激情和灵感的一段时光。我要感谢那些对我持有强烈批判立场的人，他们让我学会了倾听、理解和宽容。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赵晓东，她始终都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和不留姓名的编校者。在我深陷压力之日，是她让我坚强；在我面对赞美之时，是她让我从容。我要感谢所有那些支持我、喜欢我、接受我和批评我的读者们。在过去这些年里，因为有了他们，我的生命才变得更精彩、向上、充满阳光。他们是我能够坚持到今天的力量源泉。现在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向读者送上我的真诚和我的书，诚惶诚恐地等待读者的评判。对我来说，我的上帝不是任何一个有权有钱有势力的人。我的上帝是读者。永远都是！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, likely '王康' (Wang Kang).

2008年4月20日



## 前 言

历史与现实的对话

本书的酝酿和写作历时三年，增删五稿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所涉资料主要来自我对当事人的采访，以及公开的出版物，也有一些是我亲身经历的，内容浩繁，巨细混杂，困难在于比较、鉴别以及取舍。这需要时间，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。

一个国家，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，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；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。我回想 1990 年至 2002 年的中国，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，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，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，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，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；不是在于她的崇尚伟大精神，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；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，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，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，眼睛里面只有未来。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，进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。

但是这本书仍然只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正面和侧面，不是全部，其中不免牵涉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，也用大量篇幅去叙述那些看来无关宏旨的小人物和小事情，对于另外一些大事件，比如申奥成功、中美飞机相撞、禁止法轮功、揭露远华案、三峡水利工程建设、中国足球冲出亚洲，等等，却又几笔略过。其增删繁简的主要依据，并非出自史家标准，甚至也不是时事政治的尺度，而是作为一个记者的眼光。书中所叙仍以指出中国的弱点为多，这也不是否认我们国家的进步，而恰恰想要更好地进步。在我看来，有时候轰轰烈烈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久远，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。其沉浮逆转，书中已经述及。

中国是一个是非太多的国家，20 世纪 90 年代给予我的一个教益，是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是非。人的一辈子，有些事情是永远不能妥协的，比如信念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接纳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。人各有志，也都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。另外一方面，自己不赞成的东西，未必没有存在的

根据。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,当然怀着纯粹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,但是我特别希望摒弃情感上的偏见,客观平和地对待那些我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,又希望以海纳百川的精神,增进各种思想的沟通,化解成见,相互补充。我的一个同事,也觉得“是非过于分明,有时候未必是件好事”。她的年龄较我几乎小了一辈,天资聪慧,拥有自己的爱憎好恶,却又与世无争,其处世平和,同龄少有,她有一次以林语堂为例提醒我:“不要因为思想犀利,忽视了从容的魅力。”

检讨过去几年里我写的东西,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过于“犀利”,所以每次都会引起争端,以致书评的篇幅远远超过书的本身。有人说很好,有人说很坏,对于所有这些褒贬,我都心存感激。2002年春天出版的一本书,还把马立诚和我在四年前合写的《交锋》说成是“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我们党发起的新一轮交锋”。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、梁柱先生主编,里面专辟一章批评《交锋》,计有四十二页,又牵连到我写的另外几本书。无论那些话说得有没有道理,我都觉得欣慰。对于我的赞扬与批判都能连篇发表未遭阻碍,而我依然拥有思考、写作和发表的权利,这本身也能证明我们国家已有长足的进步。

可是很多事情不能简单地以好与坏而论,实际上不论多么高明的作者,都不能摆脱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,我本人接触过一些达官贵人,更多的时候是生活在寻常百姓中间,较普通人的情感,以一己之眼光、见识与胸怀去观察大世界,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,又不肯改变初衷,所以除了再接再厉,别无他途。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,致使他人不快,那只是因为我的修炼不够,而非本意。

我总有一个心愿:让新闻成为历史,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,让政论像小说一样动人。首先要明白的是,对历史的理解,不是在书斋里可以读到的,也不是仅凭个人天赋就能产生,而是要在积年累月的历练中,见到不同的人,看到不同的生活,听到不同的声音,自己又有过最糟的和最好的境遇,对比起伏跌宕,品味其中酸甜苦辣,才能领悟。

我本人自幼崇尚技术,轻视文史,家境算是好的,又不属于特权阶层。如果一切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发展,自然一帆风顺,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政治是非。可惜“文革”这样的社会变化任何人都不能躲避,我自此中断学业,少年离家,先在农村做一电工,后来参军,白天练习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,腰酸腿疼胳膊红肿,晚上却又不肯早睡,蒙在被子里打开手电筒学习数理化以及英文,不幸被连队首长发现,批评我不安心保卫祖国,还想到外国去,于是悬崖勒马,把全副身心投入军事。有一天首长忽然告诉我不要再埋头训练,改行写新闻。我知道那并不是因为我有文才,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我的父亲在报社工作。父亲的确是做新闻的。

他出身于旧式农家，却又向往新生活。十七岁离家出走，以文为生，十八岁投奔共产党，一生本分，听党指挥，而将个性收敛，把思想压在内心深处。我在童年时总能听到他的朗朗笑声。他喜欢在周末和我下围棋，一边落子一边给我讲“霸王别姬”的故事，还说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。但是后来他的笑声渐渐少了，终日沉默寡言，总把双眉紧锁，身体越发消瘦，体重不到九十斤。人家都说“人到中年瘦是福”，但我知道他的变化与“福”无关。有一次我想让他开心，把围棋捧到他面前，心里期望再次听到他的笑声，他却推开棋枰，淡淡地说他不喜欢下棋了。1978年夏天，我被调回北京，到新华通讯社做记者，在离开父亲十年之后终于回到他的身边。那个早晨我冲进家门，告诉他“子承父业”的消息，以为他也会高兴，不料他仍然没有笑容，仍然沉默。1985年他六十二岁，身患肝癌，病入膏肓之际用枯槁如柴的右手拉住我的衣角，好不容易开了口：“做……正直……诚实的记者，很难……很难。你能……能吗？”那一瞬间，他深陷的眼睛里有一滴泪，既纯净又混沌。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在哭。我来不及细想他的话，只盼他的眼泪能流下来，因为怕他把泪水带进坟墓。可当时他躺在病榻之上，仰面向天，所以眼泪并未夺眶而出。他就这么走了。我去八宝山公墓为他送行，看着他的躯体和眼泪在火焰中化做一缕青烟，然后又到他的办公室去收拾遗物，有些文件，有些信函，有些书籍，有些会议记录，最厚重的一叠稿纸居然都是他的检讨，其中一份的题目是《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》。那是他在十八年前写的，竟还留着。我在他的桌前坐下，只看了第一行，已是泣不成声。

因为有了这些经历，不免品格复杂，越是思念父亲就越是不愿像他那样无奈地生活，头脑中形成“否定一切”的习惯，崇尚精神的独立与自由，不能与流行的政治思想雷同，又不肯按照多数人的标准攀登成功之梯。于是退居斗室，终日写作，孤灯寂影，心底风起云涌，耳边澎湃有声，都只能对无形的听者诉说。经过无数悲伤与欢乐，重温父亲一生，逐渐明白做人须比做事付出更多，生命的质量比生活的质量更值得求索。此后几年稍有成果，又去感受被赞扬和被批判、被追捧和被冷落、被热烈包围和被寂寞笼罩，在这两极世界中不停地冲撞，这才越来越把胸怀敞开。内心拥有了自己也拥有了整个世界，方知个人渺小，生命的独立与自由，要在大历史中获得。

二十五年前开始记者生涯的第一天，阎吾先生对我说：“新闻是瞬间的历史。”他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军事记者、我的上级，也是我的前辈。他们那一代人，是以这样的信念投身于自己职业的。我现在所做的工作，只是在秉承这一传统，把无数瞬间连缀起来，加入个人判断。不敢期望这将成为历史，能够让读者喜欢，

已是很奢侈的愿望。

就我本人来说,还有一个多年来挥之不去的私念,就是能够对得起父亲遗愿,所以我将本书献给我的父亲。如果他还活着,该是八十岁了。

作 者

2002年12月15日于上海

# 目 录

前 言 /001

## 第一部 谷底(1990—1991)

第一章 活着的祖宗 /002

第二章 大灾年 /026

第三章 死灰复燃 /046

## 第二部 风云际会(1992—1994)

第四章 转 折 /069

第五章 盛世无英雄 /096

第六章 新人治国 /129

## 第三部 潜流激荡(1995—1998)

第七章 软着陆 /155

第八章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 /187

第九章 朱镕基与民心向背 /214

**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(1999—2002)**

**第十章 殊途同归 /240**

**第十一章 忏悔的年代 /280**

**第十二章 新人类,新生活 /308**

**尾声 后继者 /343**

第一部

**谷 底**  
(1990—1991)

## 第一章 活着的祖宗

1990年那个春天，整个中国似乎深陷因果轮回之苦。

在帕米尔高原和长白山之间，火焰绵延不绝，长达四千八百公里，覆盖着西北、华北和东北的大片国土。一位学者把这条带状的火线叫做“地火”，说它已经燃烧几百年，每天烧掉至少五十万吨煤。不过，没有死人，伤者也很少，这是北方人的幸运。可惜这条“地火”之外，火灾也是层出不穷，平均每天一百五十六起，烧死七个人，还烧掉八十万元人民币。新年第一个月，北京接到五万件告状信；上海有数千吃了不洁毛蚶感染甲肝的人，尽管大都痊愈，却还抱怨不已；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；云南发现一百四十六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。还有刑事犯罪、环境污染、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、怠工的、吸毒的、嫖娼的、冷嘲热讽政府的。诸如此类的消息，在当日媒体上是没的，所以老百姓很难知道。普通人身边的气氛倒是和和平平的。10日，在北京城内实行了七个多月的戒严被取消。东长安街上的国贸中心大厦即将竣工，去年夏季被打烂的那些外紫内白的玻璃幕墙，也已恢复原样。这时候已是旧历腊月，“祥和”成了北京人的口头语。春节终于来到，成千上万个家庭团聚在一起，其乐融融，不过，因为那一场风波，也有不少家庭是不祥和的。春节之后的几个星期里，坏消息接踵而至。外经贸部的官员一个劲地抱怨出口下降。农业部长何康说，夏季粮食减产，形势严峻。统计局的公报说，工业生产下滑了，全中国的经济都在“疲软”。但是最要命的是人心离散。一个退休的军官指着刊登那个消息的报纸说：“疲软？什么疲软？就是混蛋。”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个决定，宣布要“多一点计划”，还要“加强集中”，这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说，都是有些道理的，可是哈尔滨市政府有个心直口快的干部就不以为然。“计划？”他站在自家的硬杂木拼花地板上，对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抱怨道，“我们不会‘计划’别的，‘计划’浪费在行。‘大跃进’进去几百亿，‘文



革’进去几百亿，‘华国锋时代’进去几百亿元。这些钱啥也不用干，光吃，也够中国人吃两辈子了！”他的语气夸张，数字也不准确，但不满的情绪却是真实的：“他妈的，我‘搞计划’三十多年了，这些事情我都干过，我比谁都知道。”

经过 1989 年那场殊死搏斗，中国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分裂了，不过，无论是那些喜欢 80 年代还是不喜欢 80 年代的人，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，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，至少有二十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，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，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，说是“经济制裁”，让中国人喘息不得。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后来拿一句诗来形容这时的形势，说是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。

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“黑云”：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。在 90 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，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，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，怎么也放不下来。

第一个消息来自新华社驻东德的一个记者。他的报道说，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总书记昂纳克开除了。一个小时以后，又有消息说，那不是昂纳克，只是他的一个助手。新华社于是赶忙收回那条新闻，《人民日报》则因为自己没有理睬新华社的消息而好一阵庆幸。可是，新的消息又来了，说昂纳克的党籍被开除了，这回是真的。还有，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战后三十五年以来第一个共产党占少数的政府。这个国家群雄并起，各方政治派别达成协议：总统应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捷克斯洛伐克人。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，这等于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权给剥夺了。更要命的是，那里的老百姓居然接受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式的结果，因为已有消息证实，布拉格的居民正在街上游行庆祝，有如 1968 年的“布拉格之春”。书店老板看了这情景，当场把不同政见者的那些著作拿出来，很快被抢购一空。这一边，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把自己的领袖日夫科夫开除出党。春天开始的时候，共产党在东欧的处境就更糟了，有点像过去很多年里被他们宣布为“反动政党”并加以取缔的那些组织了。4 月 17 日，布拉格市检察长索科尔以一个执法者的身份，要求两周之内在布拉格取缔共产党的活动。布拉格市民只等了五天就不耐烦了，大约七千人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，冒雨高呼口号，发表演讲，全都是支持检察长的。游行队伍的标语有一幅最为醒目：“支持索科尔，取缔共产党。”东德倒是没有这样的集会，也没有这样的标语。可是有至少一百万苏联和东欧的移民越过倒塌的“柏林墙”跑到西德去了。那道墙是六个月前被拆除的，再过六个月，也即 1990 年 10 月 3 日，分裂了四十五年的德国统一了。